

大外交书系

德国前总理
与中美苏三大国伟人们的内幕谈话纪实
20世纪末国际风云录

伟人与大国

Menschen und Mächte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 / 著

梅兆荣 罗国文 王熙敬/译 梅兆荣/校

海南出版社



伟人与大国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 / 著

梅兆荣 罗国文 王熙敬 / 译 梅兆荣 / 校

Menschen und Mächte

海南出版社

Menschen und Mächte

by Helmut Schmidt

Copyright © 1989 by Helmut Schmid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lmut Schmidt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Haina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 © 2008 海南出版社

本书中文版由赫尔穆特·施密特授权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30-2007-17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伟人与大国 / (德)施密特(Schmidt, H.) 著;梅兆荣,罗国文,王熙敬 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8.5

书名原文: Menschen und Mächte

ISBN 978-7-5443-2453-3

I. 伟… II. ①施…②梅…③罗…④王… III. 国际关系—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812 号

伟人与大国

作 者: [德] 赫尔穆特·施密特

译 者: 梅兆荣 罗国文 王熙敬

校 者: 梅兆荣

出 版 人: 苏 斌

总 策 划: 刘 靖 任建成

责任编辑: 黄宪萍

责任校对: 邢静文

装帧设计: 嵇倩女

责任印制: 杨 程

印刷装订: 北京冶金大业印刷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 杨秀美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邮编: 570216

电话: 0898-66812776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278 千

书 号: ISBN 978-7-5443-2453-3

定 价: 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新版前言

《伟人与大国》一书，是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1987年夏天发表的重要著作。它记载了作者自1969年担任政府职务以后，特别是在1974~1989年担任联邦总理期间，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会晤和会谈的内容，概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东西方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作者对三个大国以及日本的国情和领导人特点的认识。本书既是与“伟人”内部谈话的回忆录，又是国际风云的纪实，也是一个诠释当年德国外交战略的经典。虽然本书问世至今已有近20年时间，且作者在观察问题时难免带有主观性和党派政治的烙印，但今天读起来仍使人感到真切，尤其是作者渊博的知识、独到的见解和明确的主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应当说，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对于研究当前的国际形势也有参考意义。

1988年，本书作者为中文版撰写的序言中指出，他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因为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这句话不仅说明了施密特对中国的重视，而且反映了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必将成功的信念，以及他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敏锐嗅觉。施密特在撰写本书之前曾三次访华，先后会见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他对中国的每次访问，特别是邓小平同他的每一次谈话，都增进了他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以一个外国政治家的视角，也见证了中国的发展变化。

举例来说：1975年10月施密特作为第一个访问中国的德国政府首脑，从中国得到的印象是复杂的：毛泽东、邓小平的谈话使他难忘，中国人民的勤劳使他赞叹不已，古老的中国历史和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使他倍感钦佩，即便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人民生活水平

普通不高，而“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使他深感厌恶。1984年施密特第二次访华时，他“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胡闹”已经结束，中国“已经走上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中国领导人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比任何其他许多国家领导人更好的判断力。”1988年施密特第三次访华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取得的进展到处明显可见”，“人们自身也比过去快活多了”，邓小平的伟大功绩无疑是非凡的。当今“不是经济巨人日本，而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大。”据此，他鲜明地提出，西欧“应同中国建立良好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基于上述，海南出版社决定出版本书，以飨更多的读者，实属明智之举。

梅兆荣

中国驻德国前大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副会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

2008年4月

作者中文版序言

我感到很光荣，这本书被译成了中文，将同中国读者见面。他们会看到，我是以与美国和苏联同等的级别来看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我知道，我的中国朋友们并不喜欢听到对中国使用“超级大国”这个词；他们认为，这个词包含着不能说出口的对别国行使霸权的要求，而北京是拒绝这种要求的。尽管如此，我对这三个国家仍然保持使用超级大国一词，因为与此有关的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今天，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这三个大国的政策正影响着整个世界。虽然，还另有许多对世界具有伟大意义的国家：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加拿大、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最后提到的这两个国家如同三个超级大国一样，也是核战略大国，它们同样可以在远离本国边界的地区开战。但是，到本世纪末，对于将要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60亿人来说，不管谁在巴黎或伦敦执政，不管新德里、墨西哥城、拉各斯或其他国家的首都推行什么样的政策，它们所起的作用仍将是相当有限的。相反，来自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政府的对全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它不可避免地几乎涉及整个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没有戈尔巴乔夫和里根，1987~1988年以来就不会有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就核裁军条约达成的协议，没有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就不可能结束中国人和俄国人相互猜疑的敌对关系，这种敌对关系在近半个世纪之久的时间一直给亚洲投下阴影。没有邓小平倡导的对中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所取得的成功，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便难于

作出仿效中国的决定。同样，这对世界上其他一系列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来说，也是适用的。

70年代初，当我出任我国政府部长时，我就试图使自己对中国未来的作用形成一个总的看法——这在堪培拉、新加坡、东京，美国西海岸以及其他任何地方进行会谈时，都曾经是我关注的最重要的题目。我理解，太平洋沿岸国家长期以来所知道的是什么：中国释放的影响，与当时我们大多欧洲人想象的相比，要大得多。周恩来的邀请给我提供了在1975年亲眼看看这个中央大国的机会。遗憾的是周恩来已身患重病，无法接见我。我本人——在此期间已就任联邦总理——是访问北京的第一位德国^①政府首脑。我们之间的关系那时也很友好，但我的印象却充满了矛盾。

一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给了我深刻印象。劳动人民的勤劳使我赞叹不已。数千年古老的中国历史，特别是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使我倍感钦佩。但是，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状况不好，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我认为，在经济上应当把中国看作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克服这种状况还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使我深感厌恶。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国家对人以及对数千年的古老文化传统，竟然肆无忌惮地，残忍地进行迫害和诋毁。

1984年我第二次访问中国参加35周年国庆时，我有一种极为轻松的感觉。我高兴地看到，人们已经结束了这一犯罪的瞎胡闹，国家已经走上了一条很好的旨在实行改革的路线。我又一次会晤了邓小平，同样会晤了中国其他一些领导人。再次见到邓小平使我感到特别愉快。我知道，他是对经济开放不断给予推动的人。在我看来，同我在其他许多国家的领导人那里所体验到的情况相比，他对自己国家的经济问题具有更好的判断力。

同时，显而易见的是：经济改革过程和使经济管理机制现代化的过程，都还需要很长时间。当然，大街上和城市商店里的景象已发生

^① 意指当时的联邦德国——编者

了根本变化。我明白：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会带来进步，肯定也会出现一些挫折，但毕竟它已经走上了正确的方向。生产产量的上升是惊人的，特别是在农业方面，现在工业也应当跟上来。我觉得，处于优先地位的有三大主要任务：教育和培养大多数人具有首创精神和责任心。通过中央银行建立有效控制货币量的机制，以使价格的逐步放开不致转化成通货膨胀性的发展，建设足够的基础设施，以便可以真正地实际利用从上海到乌鲁木齐之间，以及从哈尔滨或大连到广州之间巨大的内部统一大市场。

这本书是1987年4月脱稿的。当时我写道：“中国的改革路线进行得越顺利，对莫斯科的挑战就越有力。”这句话已经证明是正确的，因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现在走上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北京是在1979年改变方针的，莫斯科路线的变化则是在5年之后。但是，中国时间上的领先并不是使我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机遇比苏联改革成功的机遇更大的唯一根据；第二个根据在于苏联官僚主义的惰性，它比中国官僚主义走上墨守成规轨道的历史要长一倍；第三个根据是中国人具有更大的个人灵活性，特别在沿海地区和海港城市。当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有有利条件，它是在一个总的生活水平明显地高得多的水准上开始的。与此相反，中国的有利条件在于，它用于军事任务的耗费所占社会总产值的份额，从未像苏联直到眼前所达到的那样高。把苏联庞大的军备工业转变成生产民用的物资也是一项巨大工程，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任务。

1988年秋天，我第三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所取得的进步处处明显可见。我发现，人们自身也比过去快活多了。他们愉快地生活着，较之70年代中期受压抑的那种气氛，差别是很大的。我在15年内第三次会晤邓小平，看到他对自己国家取得的进步也感到十分高兴。

后人编写历史时将会确认，中国人民应当感谢孙中山、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是什么。在我看来，邓小平的伟大功绩现在就是肯定无疑的，因为我亲身体验过这种功绩。因此，我把去年为《邓小平文集》

的德文版撰写前言看作是一大光荣。我对这个人怀有一种友好的倾慕之情，同样对他的人民抱有巨大的同情。但愿他得到幸福！

赫尔穆特·施密特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Helmut Schmidt', with a stylized, cursive script.

1989年3月于汉堡

译者的话

本书是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 1987 年夏天推出的著作。该书一问世，立即在联邦德国和欧美许多国家引起重视。据出版商公布，到 1987 年 10 月初，在短短几个月内，仅在联邦德国就已销售了 23 万册，成为西方最畅销的政治书籍之一。

施密特是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69 年起先后担任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1974 年出任总理至 1982 年。本书是施密特在担任政府职务期间，特别是在任总理的八年内，与苏、美、中三大国领导人会晤和会谈的回忆录。在这个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特别是东西方关系出现深刻变化，经历了缓和、僵持、对抗等几个阶段。作为当时西方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施密特在这一系列变化中运筹策划，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由于作者紧紧抓住当时的重大国际问题，特别是东西方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又是以与大国领导人的接触、会谈为主线，因此可以说，本书是 70 年代以来一部难得的国际风云纪实。

在第一部分“同俄国人相处”中，作者详细叙述了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吉洪诺夫，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历次会谈和秘密传递信息的情况，以及作者对这些人的直观评价。在这中间，作者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特点及其缘由进行了深入分析，对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苏联的改革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也做了探讨。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观察和分析苏联政策时注意从纵向历史寻根溯源，指出苏联的扩张欲与沙俄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面对这样一个近在咫尺的超级大国，作者围绕东西方之间的缓和与合作，特别是苏联部署 SS-20 导弹所引起的导弹之争，深刻剖析了欧洲国家特别是联邦德国的处境及其意愿。为维护本国的民族利益和安全，作者反复阐释了他一贯的

对苏政策思想，这就是谋求缓和、争取与苏联建立睦邻关系，同时不放松防务，争取进行广泛合作，但不丧失警惕，在军事均势的基础上确保安全。

作者在第二部分主要回忆了自己与美国社会和美国各阶层人士进行的广泛接触，特别是与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四任美国总统，以及与麦克纳马拉、莱尔德、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舒尔茨等美国一大批军政要员的关系。在这些生动的回忆中，作者充分表达了自己对美国怀有深厚的感激之情，表示对美国民族巨大活力的一贯称颂，强调保持德美结盟关系对维护德国利益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作者也对美国一个总统一个主义，在同苏联打交道中往往忽视盟国利益，并在政治、经济上企图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习气等，持激烈的批评态度。为此，作者特意叙述了同比较重视与盟国磋商的福特总统的友谊，同摇摆不定的卡特总统的不和，以及同一切从“实力”出发的里根总统的摩擦。通过一系列淋漓尽致的描述，作者坦诚地揭示了欧、美特别德、美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既矛盾又相互妥协的鲜为人知的内情。比如北约“双重决议”产生的背景和经过，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围绕对苏政策的争吵，以及在经济、货币和贸易等问题上的利害冲突等。此外，作者对美国的社会情况，对东海岸权势集团及新兴的中西部和南部集团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作用等，也作了富有启示的介绍。

第三部分“中国——世界第三大国”，是作者对他同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亲切会晤和会谈的回忆和叙述。1975年和1984年，作者曾两次访华，在此期间，中国领导人也曾访问联邦德国。通过叙述对中国的观感、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改革、近些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的发展前景，作者表达了对中国的友好感情，特别是对邓小平的敬仰。作者认为，不是经济巨人日本，而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大。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在竭力掩盖其侵略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历史，至今缺乏认罪感，这正是日本发展的危险性所在。

作者在本书结尾，对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趋势作了展望。指出当今世界已形成两个令人瞩目的大三角关系：一个是苏、美、中政治上的三角，另一个是美、日、欧洲共同体经济上的三角。作者预计并期

望西欧通过联合在下个世纪成为第四大力量，而中国随着改革开放还将大大增强其在世界力量对比中的分量。基于这一前景，作者力主西欧同中国建立良好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施密特知识渊博、思想敏锐，在政治、经济、军事、财政、金融等方面，均有深刻的见解和明确的主张。迄至目前，作者已出版《论均势战略》、《西方战略》、《伟人与大国》等 11 部著作。在西方世界，施密特被认为是在经济政策上卓有建树的“伟人”，政治、军事上“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当然，正如作者自己在本书前言中所说，他在观察和分析国际问题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和党派政治的烙印。

我们在翻译本书时，力求忠实于原文，并尽可能保持原文风格，但由于水平所限和时间仓促，不妥之处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孙士英、梅晓波、解世波同志在本书翻译时，协助做了一些工作，在此也表示感谢。

梅兆荣

1988 年 6 月于北京

德文版前言

本书包含我与苏联、美国和中国这三个重要的世界大国交往的回忆和评价。这不是写一部自传的尝试，因为在我看来，政治上做自我介绍总有点缺乏说服力。就其本质说，自传会诱使作者把自己描绘得完美无缺，或至少使自己的形象显得比以后历史的评判要好一些。当然，政治家和艺术家们的回忆录常常引起我的强烈兴趣，激励我也进行思考，并对自己所获得的看法作批判性的审查，同时进行补充或修正。

下面我分三大部分来描述我个人对俄国人、美国人和中国人的印象，特别是我对这些国家领导人的亲身感受。我尝试着阐述他们和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这些问题曾经涉及我的国家，或我个人，并且部分地今天仍然如此。在少数几件事上，重复或对问题再次加以探讨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事情对华盛顿或莫斯科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特别是我在联邦政府任职的年代，我经历过各种各样令人神往的人与人之间的会晤：有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部长，有艺术家、科学家，也有从未公开露面的人。人们常常描绘身居要职的政治家或国家领导人的寂寞，但这个词只反映了一半真理。因为事实上我在任政府职务期间建立了许多友谊，经历了更多的真挚的伙伴合作。

目前，所有这三个世界大国都在进行着伟大的、部分是令人震惊的变革。这些变革表明，从德国利益^①的角度来看，对80年代中期已在莫斯科、华盛顿或北京结束了的或即将结束的时代进行描述和评价，是正确的。这三个世界大国的内部变化是否确实会给世界带来重大变化，这是完全没有把握的。戈尔巴乔夫取得持久的变革性成就的

① 意指当时的联邦德国的利益——编者

前景，在我看来也没有把握。对莫斯科与华盛顿通过条约实行军备控制并就均势达成协议的前景，由于里根权力衰落和他在短期内即将结束任职，也有明显的保留。他的继任者很难是一位具有世界经验的战略家，除了尚未解决的那些外交任务之外，这个继任者还必须首先接管那些美国巨额外债所带来的问题。在北京，邓小平年事已高，他的威望是否能长时间地保证改革路线的持续性。不是经济巨人日本，而是在世界经济上暂时还相当不重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世界政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但对它未来的路线还不能清楚地看出来。谁要想估量一下未来的机遇，他就必须了解决定当前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将影响未来，他当然只能去臆测。

我并不奢求提供一种亲自经历过的我们时代的世界史。我所希望的，主要是把我自认为我从外国会谈伙伴那儿学到的或理解到的东西，多少留传给别人一点。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不是依据官方的文件或者在此期间已经开放的档案，也不借助我的会谈伙伴已经发表的东西。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在这里描述的对话和分析，完全是以保存下来的自己的笔记为依据的。这些笔记不是要传播一个客观的历史画面，而是主要想传播我曾以此为出发点或我曾认为应当以此为出发点的那些印象，以及我所获得的那些印象和结论。

如果否认我的主观性，或者排除我的德意志特性和我的社会民主党特性，那将是不自然的。这是这样一个人的个人报道，这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诞生，他在青年时代——由于他父母的原因——没有成为纳粹，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过兵役，并且以为自己必须履行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义务。本书复述了这样一个人的认识和经验，这个人在26岁时当了战俘，由于一些年长得多的同志的帮助和影响而成了社会民主党人，并且在一生中相当晚的时候——感谢西方盟友，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盟友——才第一次体验到了民主。

康德的绝对命令论和马尔克·奥雷尔的自我观察论对我的影响要比拉萨尔、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影响更强，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一些年长的社会民主党的同志和朋友。在外交政策上，是具有世界经验的

市长马克斯·布劳厄、威廉·凯森、恩斯特·罗伊特和赫伯特·魏希曼，以及社会民主党联邦议会党团领袖弗里茨·埃勒、卡洛·施密德和赫伯特·魏纳教育了我。而我在经济方面学到的东西，则首先应归功于海因里希·戴斯特、卡尔·克拉森、阿勒克斯·默勒和卡尔·席勒。当然，我得补充说，在企业、工会、科学和出版界，以及在官员、军人和我那个时期的其他联邦议会党团——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中居领导地位的某些女士们和先生们，他们也对我的判断和行为产生了影响。

国外的榜样和范例对我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50年代后半期，我作为年轻的、不重要的议员登上了国际舞台，与我在汉堡所处的环境相应，我是作为一个亲英派出现的。尔后，到50年代末，我越来越清楚，我们的命运与美国的命运联接得多么紧密。60年代，我认识到德、法友谊是建设欧洲和平秩序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在我看来，这一和平秩序在所有这些年代都是最为重要的。

公元后10世纪的历史作出了德意志民族在欧洲的地理中心繁衍发展的安排。同欧洲其他许多民族不同，它既不是生活在一个岛上或半岛上，也不是生活在有自然屏障的保护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片裸露、平坦、人口又比较稠密的土地上。我们德国人比欧洲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多的外国邻居。从全世界看，只有俄国和中国被如此众多的邻居所包围，但俄国和中国都是大国。与此相反，德国是小国，德意志民族由于希特勒发动全面战争和招致全面失败的后果，今天仍被分裂。奥斯维辛集中营和大屠杀在我们邻居的意识中，还将非常长久地留下阴影——对今后出生的德国人所从事的一切都投下阴影。

我一向确信，每个民族都有自决的天然权利。也许下一个世纪有朝一日我们德国人又可以走到一起，那么，这当然不是在我们邻居反对的情况下发生，也不会在他们对德国人缺乏信赖不能持久地有能力同邻居和睦相处的情况下出现。

如果说，德国人和俄国人离充满信任的睦邻关系还有相当一段路程，那么，这个责任不完全在我们。不仅是我们的德国人，欧洲许多国家的人民都感受着苏联占领欧洲东半部的威胁——尤其东欧人民。苏

联对扩张性安全的追求以及它向国际上传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努力，造成了动荡不安和潜在的威胁；从这一局势中产生了西欧与北美的大西洋联盟。反之，某些俄国人同样看到自己受到威胁——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他们把德国视为可能的危险根源这种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如此，我完全理解苏维埃俄国人，因为他们在希特勒的战争中损失了2000万人。苏联各族人民希望得到和平，如同我们一样，他们的共产党领导人也抱有这一愿望。

鉴于那种潜在的威胁，我们德国人需要与其他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与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与我们的西欧朋友们结盟。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努力与苏联人、波兰人以及与本大陆东半部的其他邻居们和睦相处。这一双重任务是极为艰巨的。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任务，也会不时地引起对我们德国人的怀疑——一会儿在东方，一会儿在西方。对此，本书也将叙及。

自70年代初以来，联邦共和国不再是一个政治侏儒了。我们6000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建立起了世界上伟大的，效率最高的国民经济之一，而且在70年代也学会了在世界上发挥一种与它的地位以及与其的地理和历史形势相适应的政治作用。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在地理上与我们直接为邻的国家以外的领导人，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以帮助，正如他们反过来也接受了我们的帮助一样。

在30多年的议会政治工作中，在担任总理8年多的时间里，在参加联邦政府的13年内，以及从那时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为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谅解而作出贡献。这项任务仍然是宏伟的，而且每一代人都会重新面临这项任务。因为，和平不会一劳永逸地为所有的人建立起来，和平必须不断地重新加以缔造。我把我这一代为和平而效劳视为我最重要的义务。我知道：在边界那边我的会谈伙伴们，对他们的任务也是这样看待的。尽管如此，各种利益冲突，对自己的和别人的利益作错误的解释，还有内政上的强制性因素，都可能不断地导致局势危险地尖锐起来。因此，有必要了解别国人民和政府的利益、恐惧和希望。谁要是只从敌情出发，他就不可能缔造和平。谁要是不与

别人交谈，不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就不可能理解别人。本书首先是与世界大国的国家领导人进行会谈的结果。为此，我对他们表示感激。

此外，我挂在心上的是，对那些在修改本书草稿时用建议和批评帮助了我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库特·贝克尔、维利·伯尔克汉、克劳斯·伯林、格尔德·布塞柳斯、延斯·菲舍尔、曼弗雷德·拉恩斯泰因、鲁特·洛阿、汉斯·马特赫弗、洛塔尔·吕尔、欧根·泽尔布曼、曼弗雷德·许勒尔、霍尔斯特·舒尔曼、瓦尔特·施蒂茨勒以及我的妻子。不是所有的批评意见我都接受了，对于回忆和判断中的错误和缺点，完全由我个人负责。

书稿是1984年开始写的，由于不断有其他的工作，到现在才结束。我希望还有足够时间，在另一卷叙述我与欧洲国家及其领导人交往中的印象，特别是法国以及整体的欧洲。

赫尔穆特·施密特



1987年4月于汉堡